

赵树理

中卷

研究文集

赵树理论考

董大中 著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

赵树理研究文集

赵树理论考

中卷

董大中 著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自序

这是我有关赵树理的第三本著作，有评论，有考证，以考证为主。

我上过不到两年的初级中学，便工作了。以这样的学历，也来搞考证，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过去对赵树理知之太少了，而赵树理谈他自己尤其少，偶有谈到，也多是一笔糊涂帐。赵树理平生十分尊重“事实先生”，关于他自己的生平“事实”，却必须由后人来考证。是耶？非耶？幸欤？不幸？

尤其不幸的，还在于这位作家在新潮文化中受到冷落。这似乎是必然的。第一，他出身于农民，又始终生活在农民之中，本身也最“像”个农民。第二，他如痴如醉地迷恋在大众文化之中。第三，他对中华文化有特殊的兴趣，而跟西方的新思潮多少有点隔膜。

赵树理的未来命运如何，难以预测，我们只能等待“未来”作回答。

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大众化上所作出的贡献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而大众化，乃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赵树理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他正远离我们而去。不过，他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

作家可分为五级：经典作家，伟大作家，杰出作家，著名作

家，作家。赵树理定位在哪一级，是“大师”还是李有才式的“板人”，是作家还是非作家，这在他，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想及此，我感到欣慰：这本书有它存在的价值。

这本小册子编成很早了，一拖再拖，同时又一增再增。现在终于沾了赵树理诞生九十周年的光，能作为《研究文集》的一部分，跟近二十年来各位学者所写的众多优秀论文一起，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我所写有关赵树理的论文，当然不止这几十篇，还有一些编入我即将出版的一本文艺史料集和别的集子。编在这里的，自认为学术性强一些。有三几篇分别编入两本书里，这是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阅读需要。还有些问题，比如对新文学历史的分期、赵树理文艺思想的某些方面等，读者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可以碰到。这是写单篇文章难以避免的，也算是“再三重复”吧。本书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79年，最晚写于1995年，长达十七年，前后观点可能有不一致处，这又是必然的。每篇文章的写作，都受到当时大气候的制约，在视角与观点上，在用语上，又必然留下那个年代的印记。这些都不再改动，以存其真。

对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我要表示深深的谢意。

1995年11月28日

目 次

自序·····	(1)
---------	-----

第一辑

赵树理论·····	(1)
“当代文学四十年” 问答录·····	(16)
赵树理与大众文学 ·····	(17)
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 ——介绍赵树理的一批佚文 ·····	(25)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试谈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 ·····	(43)
赵树理和他的《“锻炼锻炼”》·····	(60)
重新认识《邪不压正》 ·····	(71)
论赵树理的佚诗《歌生》 ·····	(85)
读《〈买猴儿〉讽刺了谁?》·····	(99)
赵树理与鲁迅·····	(102)
赵树理与民间文学·····	(109)
赵树理与曲艺·····	(125)
“有韵话” ——赵树理创造的文体 ·····	(141)
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与我国当代文学·····	(150)

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	(159)
赵树理小说艺术琐谈·····	(165)

第二辑

赵树理与长治四师学潮·····	(179)
赵树理“萍草生涯”考·····	(187)
西北影业公司在太原·····	(209)
从《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说到 赵树理 1937 年夏的行踪 ·····	(215)
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的两年·····	(224)
《赵树理文集续编》编者的话 ·····	(243)
赵树理笔名考释札记·····	(258)
《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史实 ·····	(281)
彭总为《小二黑结婚》题词的前前后后·····	(289)
关于彭总为《小二黑结婚》题词的时间·····	(297)
太行山文艺界在大众化上的论争 ——答刘备耕·····	(301)
《地板》写作时间考 ·····	(307)
《十里店》的写作过程 ——跋《十里店》的六个稿本·····	(313)

第三辑

赵树理研究述评·····	(323)
开拓新路之作 ——读黄修己新著《赵树理研究》·····	(338)
《为了艺术的永恒上帝》序 ·····	(343)

赵树理在国外.....	(347)
为发表两篇日文文献告读者.....	(363)
《小二黑结婚》创作五十年评述	(367)
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73)
《赵树理全集》编后记	(387)

附 录

关于赵树理研究的通信	康 濯 (403)
就赵树理编《中国人》的情况答董大中	华 山 (408)
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 ——给董大中的复信	韩冰野 (413)

赵树理论*

一

1906年9月24日（旧历八月初七），赵树理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

尉迟村所在的这一带，是一个由多种文化融汇的地区。它的西南面，是舜的古都，人们传颂着舜的故事，仰慕着舜的人格。此地自古属泽州，历来跟上党盆地来往密切，深受上党一带粗犷、倔强、富于斗争性的民风所影响。沁水为山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会门盛行，人们信教的很多。赵树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

赵树理是独生子，从小受到祖父母的溺爱。祖父信奉佛教，为“三教圣道会”的信徒。赵树理很小的时候，他就用一些儒佛相混的口诀和礼仪教他，并要赵树理做善恶之行的记录。所谓善，包括“遵王法，敬父母”、“不说假话，不欺暗室”等等，反之，便是恶。赵树理不说假话，坚持实事求是，是从小就养成的。他的父亲是个“万宝全”式的人物，会多种手艺，又会看病、打卦。赵树理也学会了这一切。他这时的唯一乐趣，是冲破高墙大院（他

* 原载《山西作家群评传》，作家出版社1990年5月版。

家的房子都是两层，全院有八副楼梯）的封锁，走到外面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他最喜欢唱上党梆子，扮演罗成、张飞。冬天，他常常到“东头院”去。村里八音会的乐器存在那里，穷汉们闲下来都到那里寻求一时的快乐，不要乐器的时候就讲故事、说笑话，俏皮话连成串，赵树理称这是他的“初级语言学校”。他很快学会了許多上党戏和各种乐器的使用法。“五四”运动那一年，赵树理到离家三十里的樵山高小读书。后来，他买到了一本由一位腐儒编写的《四书白话解说》，托名其孙子江希张著，封面上印有江希张的照片。这书正合了赵树理从祖父那里接受来的思想，他当作神圣之言，每日早起，都要面对着“江神童”的照片，正襟危坐来读。连续数年，他对那本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江神童”是他的第一个偶像。后来回忆起来，他说他这时是个“迂腐之徒”。

1925年，赵树理考入位于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跟闭塞、落后的沁水不同，这里多少有一些新鲜空气。赵树理到校初期，仍然毕恭毕敬地读着那本《四书白话解说》，仍然遵照祖父的嘱咐作着善恶之行的记录，仍然执行着“太阳教”的教规，不吃肉，敬惜字纸。他的一些怪行为被同学王春等人看到了。王春是阳城人，比赵树理小两岁，却高两个年级。看到赵树理把带字的纸收集起来，烧成灰，撒到河里，王春就奚落他，于是展开辩论，每次赵树理都输。赵树理说他信“太阳教”的好处，王春就揭露“太阳教”头头们的恶行。他的唯心主义观点被王春的唯物主义打败了，他对王春有了好感。他说王春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尊称王春为“王先生”，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向王春请教，连到图书馆借什么书，也要征求王春的意见。现在王春代替“江神童”，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

在长治四师，另一个对赵树理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常文郁。常文郁是晋城人，早在上小学时，就立志革命。考入长治四师后，他先加入国民党，以后秘密加入共产党。1927年，他又先后介绍王春和赵树理加入共产党。赵树理积极参加了常文郁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暑期以后，常文郁、王春、赵树理等人领导进步师生，同反动学生进行斗争，到冬天发展为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的学潮，取得重大胜利。在庆祝大会上，赵树理代表全校学生讲了话。

以上是赵树理人生道路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由一个“迂腐之徒”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的时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跨了很长的一步。他的这一步，对于旧中国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有典型意义的。

二

1928年春天，“四一二政变”的黑风刮到山西，阎锡山举起了清党的毒刀。首先遭逮捕的是常文郁。消息传来，全校震动，人心惶惶。赵树理听从“王先生”的劝告，两人相偕，逃离学校，到阳城的大山里流浪。第二年春，他在沁水城关小学教书时，被捕了，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自新院”度过了十四个月。这次挫折，对赵树理的生活道路都有很大影响。从思想上说，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没有改变，但却彻底跟党的组织脱离了关系，直到参加抗日战争以后也不愿回到党内（经再三说服后才重新入党）。从生活道路上说，他考入长治四师以后，认真学习了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可是现在戴上一顶“囚犯”的帽子，叫他如何“为人师表”。此后，他也曾两次在沁水和太谷县的高小里教书，但那不过是为了混碗饭吃，并没有长

久之计。所以，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他主要过着流浪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像萍草一样的漂泊”。

还在长治四师读书时，赵树理就爱上文学，对小说尤有兴趣。逃难期间，为了谋生，他写了一些稿子寄到上海，发表了。住“自新院”期间，又奉命写了一些小说、杂文，刊登在《自新月刊》上。从此，他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历来把《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当作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始，这是与事实相差很远的。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应该从二十年代后期算起。从那时到“七七事变”爆发，他写了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发表在太原和北平的一些报纸上。参加革命以后、写出《小二黑结婚》之前，他还写了二三十万字各种通俗文学作品，发表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杂志上。这十几年，我把它叫做赵树理创作的早期。赵树理能够以“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周扬）的光辉成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全在于早期十几年的艰苦锻炼。不研究这十几年，便无法说明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一位文学大师的。

这十几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逃难期间开始写作到1930年12月写出七言旧体诗《打卦歌》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文艺观，是“艺术至上主义”，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因此着力学习欧化句法，使用倒装句，洋腔洋调。现存写于“自新院”里的《悔》和《白马的故事》两篇小说，就都是相当欧化的。赵树理觉察到“学生腔”之不受“乡间父老兄弟”欢迎（如《也算经验》中所说），是写《打卦歌》的时候。这首诗的最后有一段附言：“这段故事，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想试试难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特此声明。”这里说的“试试难易”，与其说是“试

试”写作上的“难易”，毋宁说是“试试”读者接受上的“难易”。

赵树理在三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现在只找到一小部分，从1932年到1937年都有。这是第二阶段。1932年发表的长诗《歌生》，突破了“旧体格”的限制，形似现代自由体，却又明白晓畅，有很强的节奏感。193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有个人》，跟长诗《歌生》一样，语言是口语化的。1934年开始发表长篇小说《盘龙峪》。从其第一章来看，作者这时的大众化风格已经形成。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①从《盘龙峪》第一章等作品看，他这话是可信的。据王中青等人回忆，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上海革命文学队伍内部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他也写了不少文章提倡大众化。大众化，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上海的两次大讨论发生在1932年和1934年。赵树理立意写大众化“萌芽于1934年”，绝非偶然。他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上海革命文学队伍提倡大众化所结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果实。

赵树理提倡大众化，是跟他对文艺观的改造同时进行的。如前所述，在第一阶段，他信奉的是“艺术至上主义”，而现在却是“为革命服务”。他的新的“为革命服务”的文艺观和“有意识地”搞通俗化、大众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提出“夺取封建文化阵地”这句口号上。在赵树理看来，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封建文化，一种是革命文化。同时文艺已成了一种武器，他要通过斗争，把文化阵地夺取过来。为此，他立下“洪誓大愿”，不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前边说赵树理及其创作是上海革命文学队伍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所结下的一个硕果，显然，他的这种宏誓大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正是他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所在。赵树理说到做到，他

毕生都在努力实践这几句话。1936年冬天写的小说《打倒汉奸》，是一个明证。这篇小说之末也有一段“附言”，说他“为了使多数的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在小说的用词上作了种种努力。这里应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为了”后边的“多数”和“直接”两个词。搞大众化就是要让大众去读，不能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这是一个文艺给什么人阅读的问题。“直接”是一个接受方式的问题，是老百姓“直接接受”呢，还是经由知识分子或干部传达呢？赵树理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还多次说过“直接”接受和“间接”接受的问题，可见他对接受方式的重视。一个“多数”，一个“直接”，这是对赵树理的大众化的确切说明，也是他要“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具体化。《打卦歌》末尾的附言，仅仅提出了他用那种形式是为了“试试难易”，现在这个附言，则为他一生在大众化上的奋斗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三十年代前半期，虽然赵树理已经确立了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可是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确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固然“大众化”不是一个阶级性的字眼，但如果不站在大众化的立场上，不用先进的世界观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是否能真正做到大众化，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此，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赵树理的面前，就是结束“萍草一样的漂泊”生活，加入到革命队伍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着力改造主观世界。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这便是抗日战争。“七七事变”爆发，赵树理由太原回到故乡，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牺盟会，以后长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工作。他当过抗日政府的“民宣科长”，负责戏剧运动，先后创作和改编过好几个剧本。从1939年冬天起，他编过三种报纸的副刊，还参加了《抗战生活》半月刊的部分编辑工作。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建立之

初起，就很重视文艺工作在党的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并强调文艺工作者加强思想改造。毛泽东 1938 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努力创造出真正“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②的东西来。这一点，太行区党组织作了广泛的宣传和贯彻。1941 年太行区腹地黎城县离卦道发生叛乱，使根据地的领导同志和文化界人士痛感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攻势的极端必要性，并特地召开有五百人参加的文化人座谈会，进行专门讨论。赵树理这时已是根据地著名的通俗文学家，他也在这次会上发了言，“以许多实际例子，证实了大众化的迫切需要”（当时《新华日报》报道中语）。在此期间，他还在华北《新华日报》社驻地，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就通俗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这时，他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战士。如果说他在前一阶段立下的“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宏誓大愿还只是一种愿望，很难成为事实，那么，现在他所写的大量作品，确确实实是在“夺取封建文化阵地”。

至此，一位文学大师，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已经酝酿成熟了。

三

四十年代初，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两年多，主要是编《中国人》周刊。大约 1942 年底，《中国人》停刊，赵树理被调到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专门写通俗化作品”。1943 年 5 月，写出《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引起极大轰动，小说一版再版，并立即搬上戏剧舞台，一时小二黑、小芹成了根据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接着，他写了《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

《两个世界》(剧本)等,都非常成功。1947年被边区文艺界树为“方向性作家”,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

赵树理在文坛上的崛起,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密切相关的。赵树理自己说,《讲话》“批准”了他的大众化方向,这多少有点自负。毋庸置疑,在《讲话》之前八年,赵树理已经确立了写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思想,但本文说过,写大众化作品,如果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绝然达不到的。赵树理之所以能在四十年代初,以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屹立于太行山上,就在于他投身到抗日队伍里,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坚决按照党的文艺方针办事。假如赵树理依然像三十年代前半期那样过流浪生活,他能否成为一位大众化的人民作家,是很可怀疑的。尤其重要的是,大众化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实现的,它要求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抗日根据地正具有这样一个群众基础。那里的老百姓,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在经济上,通过减租减息等运动,初步得到翻身,同时民主政府通过办民校、冬学,组织他们学文化,使他们不仅产生了欣赏文学作品的强烈兴趣,也迫切要求文艺作品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把他们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来。这一切,在抗日根据地以外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的。我国进步文艺家多年以来热切呼唤的大众化,直到抗战时期在各根据地里实现,就在于根据地具有了那样的群众基础。赵树理非常幸运,他来到了抗日根据地。这样,他个人写大众化作品的愿望,与“大众”的客观要求相结合,才使他一举成功。可以说,是环境造就成了他这位大作家。

中国旧时代的文学,可分为文人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种。通俗

文学一向受文人的轻视，登不得大雅之堂。而文人文学，由于使用僵死的语言，与人民群众愈来愈远，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针对着这种文人文学的。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新文学，便属于中外文学史上流传已久的那种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纯正的文学形式，人们叫它纯文学。相对说来，中国旧时代的那种章回体、具有说唱意味的通俗小说形式，受到新进作家的忽视。所以“五四”以后，纯文学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不过这种文学有明显的缺陷，正如瞿秋白所说，它“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⑧这种情形引起了对大众文艺的热烈讨论，鲁迅等人提出了用“活人口头上的语言”写作的重要意见。如前所述，这些主张是在抗日根据地得以实现的，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赵树理。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它们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合一，是文学的通俗化。从赵树理开始，这种文学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说，从赵树理开始，我国的文学是一直沿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的道路、沿着文学的通俗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出现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越来越清楚的现象，那个时代才告以结束。我以为，从四十年代初到“文革”以前，构成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除了对文学

的革命功利主义十分强调以外，便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合一，便是文学的通俗化。由于赵树理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在文学的革命功利主义以及通俗化、大众化上的追求具有“方向性”意义，这一个历史时期也可以叫做“赵树理时代”。

现在回头说赵树理与《讲话》的关系。不言而喻，《讲话》为赵树理所代表的这个文学历史新时期提供了最宏伟的理论基础。《讲话》的核心，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这个文学新时期，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有最明确的方向。以形式言，革命的新文艺，必须创造新的形式，要“喜闻乐见”，不要“习闻常见”。对传统的民族文艺和民间文艺，赵树理都非常熟悉，他吸取它们进步的、有益的成分，而抛弃掉有害的成分。在赵树理发起成立的通俗化研究会所发表的三篇论文中，就明确指出，那种有害的成分对革命起一种“拖住”的作用，绝对要不得。周扬强调赵树理的“大众化风格”是“新颖独创”的，可谓切中要害。正是这种“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才能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说到《讲话》对赵树理的指导作用，首先应该看到，《讲话》并不是从天空掉下来的，它乃是对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以来所执行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最深刻的总结和提高，所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多年所贯彻的文艺方针、政策，都应该看作《讲话》的精神。再如前述写“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一段话，是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可见在赵树理的成长道路上《讲话》的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

《讲话》的发表，对赵树理最终成长为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也有重大意义。比如《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赵树理过去已有这样的认识，但显得肤浅，而且基本上出于他跟农民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只有在《讲